

## 周而复始的政治“狂欢”？

——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探析

郭 洁

**内容提要** 民众主义在拉丁美洲是一个周期性出现的政治现象。20世纪以来,该地区政治舞台上先后出现过经典、新自由主义和激进左翼三种不同形态的民众主义。经典民众主义与早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生,新自由主义民众主义诞生于民主化与市场化转型的特定时期,21世纪初的左翼民众主义则是新时期进步主义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时代背景各不相同,以上三种形态却都深刻反映出地区范围内贫富分化严重、政治参与受限、社会阶层固化等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在拉丁美洲,民众主义绝非“恶”的代名词,但其方案也并非解决问题的合理选项,并常常会在一场场的“狂欢”过后给其目标受益群体带来更大的伤害。与当前欧美民众主义的上行走势形成鲜明对照,受宏观经济衰退、政治生态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拉丁美洲历史上第三个民众主义周期似乎已然进入尾声。

**关键词** 世界政治 拉丁美洲 民众主义 政治思潮

---

\* 郭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100871)

在学术界，“populism”是一个极富争议的概念，迄今并无特别规范的定义。相应地，其中文译法亦不只一种，“民粹主义”大概最为常见，另有译作“人民党主义”“平民主义”等。不过，对国内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而言，更为熟悉的译法为“民众主义”。据悉，此译法最初来自1982年《拉丁美洲丛刊》刊出的一篇文章《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与阿亚·德拉托雷》。作者在文中特别指出，将“populismo”（即“populism”对应的西班牙语单词）译作“民众主义”，系有意将其与俄国的民粹主义区分开来，并强调它“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理论‘在拉丁美洲的特殊变种’”。<sup>①</sup>这一译法后来为拉丁美洲学界普遍接受并逐渐通行起来。为此，本文也继续沿用“民众主义”的说法。

## 一、共同特征及其经典形态

与世界范围内不同形式的“populism”一样，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在概念上也没有一个受到广泛认同的界定。目前，这个虽不具意识形态指向却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烙印的术语，在各种政治与媒体话语中频繁出现，甚至到了被滥用的地步。那么，民众主义在拉丁美洲究竟所指为何？哪些可以归入此类，哪些则有贴标签的嫌疑？

诚然，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有其变异多端、难以捕捉的一面，但在某种程度上确也存在着某些共性的方面。最显著的表现是领袖以代表被遗忘的普通人为名，自上而下地对选民进行社会政治动员，发起对现有精英阶层的挑战。由此出发，大致可将拉丁美洲民众主义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整个社会被分成“我们”（正直而高尚的“人民”）和“他们”（邪恶且贪婪的“寡头”）两个纵向对抗的群体。前者包括城市工人与贫民、有地和无地农民、原住民、专业人士、中产阶级及精英中的某些人，后者则意指不合理地掌握着与其数量不成比例的资源，并由此使得“我们”无法获得应有权利与福利进而享受生活水平提高的那些人。在这里，“人民”和“寡头”的概念是作为不存在内部矛盾性差异的单一实体而存在的，是同质且统一的；第二，个人色彩浓厚的魅力型领袖作为“人民”的唯一代言人居于整个舞台中心。魅力型权威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其合法性并不像传统型权威那样从“制度和

<sup>①</sup> 肖枫：《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与阿亚·德拉托雷》，《拉丁美洲丛刊》1982年第3期，第30、39页。

章程”“传统的习俗”或“封建忠诚的承诺”中派生出来,而是来源于特定领导者的个人品格及其追随者赋予他们的品格。<sup>①</sup>在拉丁美洲,民众主义是被高度个人化的,也正因如此,它同魅力型权威的存在一样,表现出特别不稳定的特征;第三,领袖与“人民”的领导或半领导关系常常取代或凌驾于传统政治体制之上。为获取对其纲领和政策的支持,民众主义领导人偏好直接面向大众的方式,而非在间接的代议民主框架内运作。同时,为强调平民表决的直接民主元素,他们往往会运用民众主义语言向“人民”授权,进而对代议制政治中固有的制度化加以抵制。久而久之,民众主义领袖的追随者也会越来越倾向或支持将民主建立在这种“代表者”与“被代表者”团结一致的直接形式之上。

从历史上看,民众主义并非拉丁美洲政治的一贯特征,而是同整个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相伴生的一个“新鲜”事物。20世纪早期,经济繁荣、社会革新与政治稳定,为新兴阶层政治家进入权力舞台提供了机会。此时,一些国家经历了最初的民众动员的短暂插曲。1924年,有拉丁美洲民众主义“哲学先驱”和“理论大师”之称的阿亚·德拉托雷(Haya de la Torre)创建了拉丁美洲民众主义政党的原生组织“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 APRA),并于1931年作为秘鲁美洲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参与秘鲁总统大选,此后至1965年前后,该地区经历了第一次持续而大规模的民众主义风暴。其间出现的主要形态,如阿普拉主义(Aprismo)、卡德纳斯主义(Cardenismo)、庇隆主义(Peronismo)、瓦加斯主义(Varguismo)等,通常被称为拉丁美洲“经典的民众主义”。它们有两个较为突出的共同特征,即寻求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以及将底层阶级整合入政治过程。包括阿根廷政治社会学家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在内的许多学者,明确地将这一时期拉丁美洲出现的民众主义浪潮与地区范围内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相联系,他们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工业上层人士的出现,以及城市平民群体(工人阶级和中低收入阶层的某些部分)的政治激活,使民众主义领导人得以创立起一个全新的、亲工业的、多阶级的和以城市为基础的民众主义联盟,直接向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提出挑战,并运用国家权力推进其民族主义的、与再分配和社会福利相

<sup>①</sup>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48—449页。

关的政策与措施,通过提供物质利益换取政治忠诚。<sup>①</sup>

在 20 世纪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历史中,民众主义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60 年代之前,该地区至少有八个国家(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曾有过不同形式的民众主义插曲。其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是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这一运动和思想体系是围绕 1946—1955 年间任阿根廷总统的胡安·庇隆(Juan Perón)——以及某种程度上包括其妻子埃娃·庇隆(Eva Perón)——而形成的。总体来看,庇隆主义建立在强人领袖、人格型政党、社会改革议程、跨阶级联盟、强烈的民族主义,以及中央集权倾向等基础之上。庇隆提出三个振奋人心的口号,即社会公正、经济自由和政治独立。他用了“正义主义”(Justicialismo)一词来表述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典型的、内容庞杂的民众主义概念。它把重点放在团结和灵活性上,本身并无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向,被囊括于其中的各种政治术语如“劳动之尊严”“资本人道化”“相信上帝”“发扬社会文化”“阿根廷人团结一致”等,不仅缺乏明确的内在联系,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经济自由则部分地体现了容许所有人都拥有一个美好生活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通过庇隆执政时期颁布的大量法令得以落实,法令规定了休假、住房、最低工资、劳动时间、奖励、医疗福利等相关事项。政治独立主要表现在所谓“第三位置”(Tercera Posición)的学说之中。这一概念在理论上意指超越“左”与“右”的世界政治秩序,采取一种既反国际共产主义又反全球资本主义的另类立场。<sup>②</sup> 美国政治学家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认为,庇隆主义不同于以较富裕及传统主义阶层为基础的右翼反民主运动,也不同于以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为基础的“‘真正’的法西斯主义”的中派权力主义运动,一方面,它“很像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一直面向较穷苦的阶级;另一方面,因其背后有一种强大的国家思想体系,又“与墨索里尼所主张的十分相似”,或可将其视为某种“低层阶

<sup>①</sup> [阿根廷]吉列尔莫·奥唐奈:《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王欢、申明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2—104 页; Thomas E. Skidmore, Peter H. Smith, and James N. Green, *Modern Latin America*, 8th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74-375。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持异议,认为进口替代工业化与民众主义两者间并非如此相恰,比如,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伊恩·罗克斯伯勒(Ian Roxborough)在其于 1984 年发表的《拉丁美洲历史的同一性与多样性》一文中强调,进口替代工业化在巴西始于 1930 年代之前,而民众主义的政治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特别是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第二任时期才真正得以展现。参见 Ian Roxborough, “Unity and Diversity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16, No.1, May 1984, p. 11。

<sup>②</sup> George I. Blanksten, *Perón's Argent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293,282; [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4—88 页。

级的‘法西斯主义’”。<sup>①</sup>同阿根廷一样,在巴西和墨西哥,民众主义运动也是由获得总统职位的领袖自上而下发起的。热图利奥·瓦加斯,这位自称“人民之仆”(escravo do povo)<sup>②</sup>、号称“穷人之父”(pai dos pobres)的民众主义领导人,将新的选举联盟、社会改革纲领同其个人高度地结合起来,在巴西实行了带有中央集权色彩的统制经济和法团主义政治。1934—1940年间,在墨西哥总统拉扎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执政时期,墨西哥农民和城市工人对于土地和提高劳动工资的要求得到满足,并被鼓励和动员起来建立自己的组织并结成联盟,直接与政府对话,而各阶级合作组织也为国家进一步控制社会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除以上几个广受关注的案例外,拉丁美洲经典民众主义的片段还包括:1939—1940年,厄瓜多尔前总统贝拉斯科·伊瓦拉(Velasco Ibarra)再度参与总统选举期间展开的民众动员;1944年,军事政变后上台的玻利维亚总统瓜尔贝托·比利亚罗埃尔(Gualberto Villarroel)在议会选举期间与其支持力量民族主义革命运动(Movimiento Nacionalista Revolucionario, MNR)发起的大规模动员与集会;1945—1948年,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Rómulo Betancourt)以对寡头展开激烈言语攻击的方式,发动对农民、农场主以及青年的广泛动员;1944—1948年,哥伦比亚民众主义人物豪尔赫·埃利塞尔·盖坦(Jorge Eliécer Gaitán)领导的政治动员活动,等等。<sup>③</sup>

## 二、世纪之交的“新民众主义”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官僚威权主义政权纷纷上台,瓦解了经典民众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促使其很快淡出了拉丁美洲主流政治舞台。直至19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冷战结束、地区民主化进程,特别是以自由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核心的改革进程的推进,沉寂了20余年的民众主义重

<sup>①</sup> [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刘钢敏、聂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32页。

<sup>②</sup> 参见《热图利奥·多内莱斯·瓦加斯遗嘱》,1954年8月24日(Carta-testamento de Getúlio Dornelles Vargas, 24 de agosto de 1954), <http://www0.rio.rj.gov.br/memorialgetuliovargas/conteudo/expo8.html>, 2017-04-02。

<sup>③</sup> Robert S. Jansen, "Populist Mobilization: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Populism," *Sociological Theory*, Vol.29, Issue 2, June 2011, p. 89.

新浮出水面。为了与经典民众主义相区别,此波民众主义又被称为“新民众主义”,迄今大致表现出两种不同类型,即所谓“新自由主义民众主义”和“左翼民众主义”。从时段上看,除个别例外,前者基本同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相重合,后者则主要与世纪之交地区范围掀起的“粉色潮流”(pink tide)相交叠。

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民众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 1989—1999 年间任阿根廷总统的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1990—2000 年间任秘鲁总统的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2002—2010 年间任哥伦比亚总统的阿尔瓦罗·乌里韦(Álvaro Uribe)、1990—1992 年间任巴西总统的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Fernando Collor de Mello),以及 1996—1997 年间任厄瓜多尔总统的阿夫达拉·布卡拉姆(Abdalá Bucaram)等。以上新民众主义政治人物,尤其是前三位,从意识形态上多被视作右翼,他们最显著的共同特征是在其执政期间,均大力推行深刻而迅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立足开放主义、倡导自由市场机制及减少国家干预,同时采用了与经典民众主义者相类似的政治动员模式、标志性语言等,具体内容包括呼吁民众反对与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相关联的精英阶层,对被其视作腐败和专断的政治阶层大加谴责,却并不攻击经济寡头,为民众提供经济稳定和人身安全,却不承诺进行财富的再分配。<sup>①</sup>

就政权而言,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民众主义”实验有成功也有失败。阿根廷总统梅内姆、秘鲁总统藤森、哥伦比亚总统乌里韦,在其第一任期后均赢得大选,再度连任。相比之下,厄瓜多尔总统布卡拉姆的执政只维持了六个月,而巴西总统科洛尔,就职一年多后因腐败丑闻遭弹劾下台。就对国内民主化进程的影响而言,彼此间也有较大差异。由庇隆一手创建的正义党,在梅内姆执政时期身份发生变化,立场趋模糊,姿态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具有对抗性。相反例子中较为突出的当属藤森执政时期的秘鲁,1992 年 4 月,在军队的支持下,藤森解散了国会,中止宪法,全面重组司法机构,通过所谓“自我政变”(autogolpe),加速了权力集中。

1990 年代后半期,新自由主义共识在全球范围日渐瓦解。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民众主义”领导人所大力推行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虽然在控制通货

<sup>①</sup> Steven Levitsky and Kenneth M. Roberts, eds., *The Resurg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

膨胀、缓解外债压力方面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却受到持续增长乏力、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以及地区范围内接连爆发的一系列金融危机(如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9年巴西和厄瓜多尔的金融危机及2001—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的困扰。1990年代末,在经历了前期的温和增长后,多数经济体陷入停滞或衰退。1998—2002年,拉丁美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总体呈负增长,贫困和失业率显著上升,收入差距急剧拉大。<sup>①</sup>事实表明,市场自身不足以解决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可能引发更多难题。新自由主义连同其实施者和倡导者一起,逐渐成为被多数拉丁美洲选民抛弃的选项,人们转而将票投给那些承诺将实施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的候选人。其结果,1998年,从委内瑞拉开始,巴西(2002年)、阿根廷(2003年)、乌拉圭(2004年)、玻利维亚(2005年)、厄瓜多尔(2006年)等国的左翼力量纷纷赢得大选、上台执政,拉丁美洲政治进入所谓“粉色浪潮”时期。

构成此波“粉色浪潮”的左翼政权,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差异甚大。人们通过附加形容词的方式将它们简单分为两种类型,即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前一类的突出代表是智利,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巴西、乌拉圭等国。在这些国家,制度化的左翼执政党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前届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在社会政策方面凸显其社会民主主义色彩。后一类的典型代表是委内瑞拉,此外,由其主导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érica, ALBA)成员国中的部分国家如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亦多被归入此列,其共同特点为左翼取向与民众主义相结合。在这些国家,政权的特点并不是以制度化政党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而是由以局外人身份赢得大选的领导人个人所展现的。从意识形态维度,可称其为民众主义左翼;从民众主义视角,则可称其为左翼民众主义。

作为此波左翼民众主义最引人瞩目的个案,委内瑞拉一直是个热点话题。民众主义在这里被赋予了另一个人格化的名字“查韦斯主义”(Chavismo)。回顾过去数十年,1998年确实称得上当代委内瑞拉政治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分水岭,是年末,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作为左翼选举联盟“爱国中心”(Polo Patriótico)的候选人赢得总统大选,此后连续14年执政,并在该国发起

<sup>①</sup> 具体数据可参见: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2—2003*, Santiago, Chile, 2003。

了深刻而持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即所谓“玻利瓦尔革命”，其主要目标包括，建立一种参与型和主体型的民主，与新自由主义彻底决裂、对抗“野蛮的资本主义及其贪婪的投机者”，赋予人民“更大的权力”和“尊严”。革命首先从宪法改革开始。1999年，经全民公决通过的新宪法《玻利瓦尔宪法》改组了政治机构（包括取消参议院和建立一院制国民大会），延长了总统任期并允许再度连任，同时将国名改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sup>①</sup>次年，根据新宪法重新举行的选举，加强了查韦斯及其执政联盟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玻利瓦尔革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变革，主要包括大规模国有化和激进的再分配计划。国有化范围涵盖了石油、电力、通讯、食品、水泥、钢材等各关键行业，涉及外资的企业或战略关系也在此过程中转变为由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模式。正是在此背景下，加之该国史上最大一次石油爆炸期的到来，查韦斯得以兑现其“建立理想国般的美好社会”的承诺。这位拉丁美洲历史上最耀眼的民众主义明星就像是慷慨给予国民恩惠的救世主，靠国际油价高企带来的巨额收入给养其“革命”进程，实施了一系列名为“玻利瓦尔使命”（Misiones Bolivarianas）的社会福利项目，向民众免费提供住房、教育、医疗、贷款、补助、奖学金、培训课程、就业岗位等。<sup>②</sup>无数的社会项目与无度的财政开支孕育出了“人民”对“领袖”情感上的忠诚。在2013年3月5日病逝前，查韦斯——这位极具个人魅力的“指挥官”，连续四次赢得总统大选。反观其执政岁月，那些被他不断强化的政治话语——“独立到永远！”“一切权力归人民！”“让寡头们发抖吧！”“他们不会得逞！”“让我们加强攻势！”“誓死捍卫社会主义祖国！”“胜利必将永远属于我们！”“祖国、社会主义或者死亡！”……仿佛成了民众主义最好的注脚。<sup>③</sup>

① 详见《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宪法（1999）》，潘灯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5年版。

② 具体“使命”项目及详情，参见其官网：<https://www.misionesbolivarianas.com/>。

③ 参见〔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从第一行开始：查韦斯随笔》，刘波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此种意识形态的模糊与混乱在查韦斯一手创建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Venezuela, PSUV）的身上同样得到明晰展现。在该党名为《红宝书》的基础文件中，统一社会主义党自我定义为：一个“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反腐败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玻利瓦尔主义的、以维护劳动者和人民利益为己任的、人道主义的、国际主义的、爱国的、统一的、有革命道德和理想的、捍卫大地母亲权利的、捍卫性别平等的、捍卫残疾人权利的、捍卫社会中参与型和主体型民主的、作为革命进程政治先锋的、具有创新性和创造力的、作为民众权利的捍卫者与推动者以及促进者的、推动内生式发展的、捍卫组织内部平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于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有纪律的、实践党内民主的”政党。Libro Rojo-Documentos Fundamentales del PSUV, junio de 2010, págs. 45-46, 参见 [http://www.psu.org.ve/wp-content/uploads/2014/12/Nuevo\\_Libro\\_Rojo\\_PSUV.pdf](http://www.psu.org.ve/wp-content/uploads/2014/12/Nuevo_Libro_Rojo_PSUV.pdf), 2017-04-08。



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情形与委内瑞拉有不少相似之处。两国都在其左翼民众主义领导人上台后,通过制订新宪法启动全面变革,对现有制度进行重构,创建政治、经济、社会新秩序。厄瓜多尔2008年宪法明确确立五权分立的原则,即在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基础上,增加了公民参与和社会监督权、选举权。2009年,玻利维亚通过的新宪法则建立了四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在原三权基础上,增设多民族选举机构为第四个国家权力机关。两部宪法亦对各自国家总统连续参与下届大选等规定做了放宽调整。<sup>①</sup>和查韦斯一样,两位领导人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和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都意图通过一场革命或运动,与“不公正、不道德”的过去一刀两断。科雷亚将其称作“公民革命”,指出革命旨在把民众从精英统治中解放出来,使权力掌握在人与社会而非资本与市场的手中,让政权为民众服务,“通过完全民主的方式,把资产阶级控制的国家变成人民控制的国家”。<sup>②</sup>在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提出了建设“社群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是人们生活在社群与平等之中”,而“社群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建立在团结、互惠、社群与共识基础之上的经济模式”。<sup>③</sup>在具体政策领域,科雷亚和莫拉莱斯与查韦斯也表现出许多共同取向,比如,都主张摒弃新自由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将支柱产业收归国有,利用出口商品收益,以一种庇护的方式对穷人及其支持者进行直接的现金转移或补贴等。

### 三、新近走势与评析

近两年来,民众主义(或民粹主义)在欧洲与北美呈高歌猛进之势,引发众多关注。诚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当前欧美的民众主义拥有许多共同基因,突出表现在顽固地反对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把这一思想附着在一系列排外且富有煽动性的社会口号上,通过唤起人们的怀旧情绪,拓宽自己的选民基

---

① 目前,根据2015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厄瓜多尔总统一职可自2017年起无限期连任,玻利维亚总统2016年2月发起的修宪公投未获通过,根据原宪法条款,可连选连任一次。

② 根据2015年1月7日科雷亚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新型厄瓜多尔经济:证明新自由主义是歧途的范例》。

③ [美]海因兹·迪特里齐:《莫拉莱斯与社群社会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4期,第23页。

础。<sup>①</sup> 相比较来看,21 世纪拉丁美洲左翼民众主义者虽不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但也未表现出全力抵制全球化的姿态。同时,与欧美的民众主义者相比,他们对地区一体化的态度也很不相同,他们虽强烈反对美国提出的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FTAA)的主张,但对加强拉丁美洲地区一体化却颇为积极且步调一致,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omunidad de Estados Latinoamericanos y Caribeños, CELAC)的组建可谓最好的例证。此外,被欧美民众主义者拿来大做文章的外国人和移民问题,显然难以成为拉丁美洲民众主义者的动员选项,后者更愿将自己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地区团结的代言人,高举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旗帜。最后,与欧美民众主义的上行走势形成鲜明对照,在拉丁美洲,种种迹象表明,民众主义的热潮已然退去,其背景大致可归为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地区范围内的政治版图发生变化,二是随大宗商品繁荣不再而来的宏观经济衰退。

如前所述,此波民众主义的兴起可视为拉丁美洲左翼回归的一个组成部分。拉丁美洲左翼自 1990 年代末执政以来,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各国左翼执政党虽政策有异,基本理念却是颇为相似的,即反对依靠不受管制的市场力量来满足社会需求,主张通过公共权力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减少和消除源自市场竞争、财富集中、性别、种族或民族、宗教信仰等不平等现象,改变现有社会等级结构,加强弱势或边缘化群体在政治过程中的声音等。21 世纪前十年,特别是 2003—2008 年,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的大宗产品出口繁荣加之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增长,为拉丁美洲左翼政权提供了落实其纲领所需的资源和政策空间。数据表明,在此期间,各种类型左翼执政的国家,基尼系数均呈现下降趋势,贫困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同时,中产阶级的人数出现增长。<sup>②</sup> 然而,自 2012 年开始,形势发生变化,拉丁美洲左翼政权日渐陷入困境。从外部条件来看,国际经济复苏缓慢、大宗商品需求和价格下降、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以及中国经济减速等是几个主要的原因。就内部因素而言,拉丁美洲左翼政府

<sup>①</sup> Lauren M. Phillips, "Populism's Rise and the Fate of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World Politics Review*, Oct. 26, 2016.

<sup>②</sup> 参见 Giovanni Andrea Cornia, "Income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Recent Decline and Prospects for Its Further Reduction," ECLAC - Macro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Series No.149, July 2014; ECLAC, 2014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Santiago, Chile, 2014.

的政策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或值得检讨之处,诸如结构性改革方面未有明显推进,某些领域政府监管过多、保护主义色彩过重,社会支出超过财政承受能力等,均对经济发展构成程度不同的制约。在此背景下,最近几年,拉丁美洲右翼力量再度兴起,并先后在阿根廷、巴西等原左翼执政国家取得政权。

拉丁美洲左翼政权总体面临的困境,在激进、民众主义力量执政的国家得到成倍放大,其中,委内瑞拉最为典型。目前,该国正深陷政治极化、经济瘫痪、社会暴力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中。委内瑞拉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及其政府惯于将此一切归咎于国内“敌对势力”的阴谋破坏及世界石油价格的暴跌、“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同盟者的法西斯霸权主义行为”等外部因素的干扰。诚然,反对派的毫不妥协是当前政治陷入僵局和街头冲突不断的原因之一,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客观上也确实造成政府财政收入的急剧减少。然而,从各个角度来看,最应为当前危机局势负直接责任的,无疑是1999年以来查韦斯政府实施了14年之久的激进且不可持续的政策。2013年3月,查韦斯过世后,此前隐匿于虚华之后的一系列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改革现有制度让其更加公正、更具包容性固然没有错,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身亦非原罪,然而,不计成本和后果地将其推向极端,则凸显出民众主义以意志主导现实的特点。目前看来,继续查韦斯路线的马杜罗政府并无应对危机的有效措施。如今,执政的统一社会主义党不得不同时在议会和街头两个“战场”与反对派展开对抗。在经济上,已持续数年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物资短缺、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等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2014年,国际油价大跌以来,委内瑞拉经济迄今已连续三年负增长,平均降幅在6.4%左右,2017年情况也不乐观。<sup>①</sup>同时,受危机影响,委内瑞拉的社会治安和生活环境发生急剧恶化,目前首都加拉加斯已成为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城市。如果说查韦斯时期是委内瑞拉政治稳定和繁荣的同义词,那么后查韦斯时期则完全翻转过来。事实证明,这场过度透支的民众主义“盛宴”最终让其目标受益群体付出了更为高昂的代价。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民众主义者遇到的问题虽不及委内瑞拉极端,但也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阻碍甚至挫折。其中较为明显的例证包

<sup>①</sup> ECLAC,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6, Santiago, Chile, 2016, p. 83.

括莫拉莱斯寻求修改宪法第 168 条以使自己在 2019 年继续参选玻利维亚总统,这一努力在 2016 年 2 月 21 日举行的全民公投中被多数否决。科雷亚则主动放弃了继续连选连任的想法,推出自己的副总统莱宁·莫雷诺(Lenín Moreno)担任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Alianza PAÍS)运动的候选人,在 2017 年 4 月 2 日结束的厄瓜多尔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中,后者虽最终胜出,但与持保守主义立场的中右翼政党创造机会运动(Creando Oportunidades, CREO)候选人吉列尔莫·拉索(Guillermo Lasso)的选票差距甚微。胜选后的莫雷诺多次向外界表示,就任后会以自己的方式和理念来执政,不会受现任总统及政府的政策束缚或影响。

那么,民众主义就这样行将从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谢幕了吗?就此波左翼民众主义而言,答案几乎是可以确定的。然而,从历史角度看,地球之南的这片魔幻之地,似乎有着孕育民众主义的肥沃土壤,使得民众主义的“繁荣”来了又去、周而复始。贫富差距巨大、政治参与受限、社会阶层固化、严重的社会暴力等无疑是其中主要动因。换言之,民众主义在很多时候是作为对由现实中紧张关系所导致的种种问题的回应而产生的,或如有学者所言,这可被解读为一种发烧征兆,“暗示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或是民众与执政精英间的纽带没有发挥正常作用”。<sup>①</sup> 毕竟,鲜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拿出超常的热情去追随和响应某种政治口号或动员,不管是愤怒还是渴望抑或其他,人的情绪多是有出处和指向的。同样,民众主义领导人真正成功之处也不仅仅在于擅用魅力和言辞,而是他们触及到真实存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妖魔化他们所说的一切,可能并非明智之举,只不过,民众主义自身并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自 20 世纪以来,拉丁美洲民众主义的实验基本以失败告终,其中最直接原因在于其经济方案事实上的不可持续。关于这一点,最经典的分析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鲁迪格·多恩布施(Rudiger Dornbusch)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塞巴斯蒂安·爱德华茨(Sebastian Edwards)1989 年的一项研究《拉丁美洲民众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两位学者总结出拉丁美洲民众主义各历史片段所共有的几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民众主义政策制定者的

<sup>①</sup> Yves Mény and Yves Surel, “The Constitutive Ambiguity of Populism,” in Yves Mény and Yves Surel, eds., *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 15.

“处方”似乎很奏效,经济获得增长,实际工资和就业率都比较高,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短缺也因进口而缓解;进入第二个阶段,需求快速扩张,外汇日益短缺,通货膨胀率上升,工资继续增长,受大规模补贴政策影响,预算赤字急剧恶化;到第三个阶段,大范围的商品短缺,通货膨胀率继续飙升加上外汇明显不足,致使资本外逃和经济去货币化。同时,因税收大幅减少、补贴成本增加,预算赤字继续恶化。政府试图通过削减补贴和实际贬值实现稳定经济的目的,结果,工资购买力大幅下降,政策摇摆不定,经济走向崩溃,政府最终无计可施,黯然退场。<sup>①</sup> 就这样,一场又一场民众主义的“狂欢”总是以极度的兴奋开始,又以颇为相似的方式落下帷幕,昙花一现的富足反是自受其害。

以上是对拉丁美洲民众主义的历史发展、不同类型、当前趋势及其所涉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等所做的简要评述。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以为,如有可能,最好避免过多使用民众主义或民粹主义这一概念。一方面是因为语义含糊、难以界定;另一方面是因为如今已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攻击之辞。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已详细论述了这一概念在拉丁美洲研究中存在的矛盾与歧义之处。<sup>②</sup>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一概念的贡献就在于“可将具有象征意义的不同素材加以塑形,可同多样的意识形态立场相结合,表现出其接受方的政治底色”。<sup>③</sup>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愿自称为民众主义者,即使是那些通常被视作民众主义者的人,也不认为自己就是“民众主义者”。就此而言,具体而人格化的“某某主义”研究可能更为可取。

---

<sup>①</sup> Rudiger Dornbusch and Sebastian Edwards, “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NBER Working Paper No.2986, May 1989, pp. 6-7.

<sup>②</sup> 参见 Ian Roxborough, “Unity and Diversity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16, No.1, May 1984, pp. 1-26.

<sup>③</sup> Marco D'Eramo, “Populism and the New Oligarchy,” *New Left Review*, Issue 82, July-August 2013, p. 7.